

董永故事的展演
及其
文化结构

◎ 郎净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卷一 故事的叙述

文化结构

陈世英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董永

故事的展演
及其
文化结构

© 郎净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07.7
LJ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郎净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1

ISBN 7-5325-3988-1

I. 董... II. 郎... III. 民间故事-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746 号

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

郎净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经发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8 $\frac{8}{18}$ 插页 2 字数 350,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7-5325-3988-1

I·1767 定价:3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59886521

序

宣炳善

民俗学界对于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大民间故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黄瑞旗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罗永麟的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贺学君的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四大传说》等。而董永民间故事可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民间故事了,但国内对董永故事却缺少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董永民间故事最初只是汉代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事父至孝的孝子故事,但是历史却选择了董永作为社会孝观念宣传的典范,一直流传至今。在流传过程中董永故事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渐渐由孝子故事演变为爱情故事。从民间故事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众的感情与想象的巨大作用。

对于这样一个著名的民间故事,对它的演变的研究在国内却一直没有著作问世,长期以来可以说是民俗学界的一个遗憾。而郎净女士的《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一书是其在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就读文艺民俗学博士时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本书的出版自然会引起民俗学界的关注。我作为郎净女士硕士时候的同学,承蒙她的厚意,在2002年5月就拜读了这篇论述董永民间故事时代演变的论文。读完以后觉得论文不但材料丰富,论述具有历史的深度,而且勾勒了董永故事发展的基本阶段,揭示了民间故事在演变过程中的民间、官方、知识分子不同群体的三重作用,从而将董永故事的历史丰富性呈现在我们面前。

郎净女士的学术叙事舒缓自如,学术心态从容不迫,这在当下浮躁的学术研究中十分难得。整本书的学术叙事风格就像是丰富多样的董永故事本身,精彩纷呈。国内对董永故事的认识总是与黄梅戏《天仙配》联系在一起。而郎净女士一直是研究中国戏曲的,在日常生活中唱戏也唱得很好,尤其是演唱黄梅戏十分地道。这样既有理性的学术认识,又有感性的审美体验,从而将戏曲研究与民间故事研究结合起来,就更富有学术启示意义。这种学术路径可以说是完全继承了顾颉刚的学术风格,因为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来自听戏所得的启发。

顾颉刚先生在其《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曾揭示了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六个方向,这六个方向分别是:1. 就历代的文化中心来看这件故事的迁流的地域。2. 就历代的时势和风俗来看这个故事中加入的分子。3. 就民众的感情与想象来看这个故事的酝酿力。4. 就传说的分异来看这个故事的散乱的情状。5. 就传说的自身解释来看这个故事的变迁的样子。6. 就这个故事的意义来看民众与士流的思想的分别。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这六个方向的揭示实际上适用于中国其他的民间故事研究。而郎净女士的这部著作很好地体现了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思路。

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破天荒的学术行为。1924年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的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之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由于以往的学者是看不起民间故事一类的材料的,但顾颉刚则不然,他的这一独特的学术思路和他在看戏中得到的启发有关。以前顾颉刚在苏州时,认为民间的说书赛会一类的东西十分卑俗无聊,于是不去了解,所以对于民间社会的情形就一直很隔膜。但1913年顾颉刚在北大预科读书时,受叶圣陶的影响,就抑制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的思想接近,逐渐迷上了看戏,北京的各种腔调、各种戏班子他都看。看了两年的戏,顾颉刚就体会到民间戏剧中的故事叙述是在变化的。从史书的记载到小说的记载有变化,而从小说到戏剧的表演又有变化。而同样一个故事,不同的戏班子

来演,内容往往不同。而同一人物在不同的戏里其角色也不同。民间编戏的乡土艺人往往是以自己的观念和想象,通过戏剧的表现方式来揣度古人,叙述自己心目中的历史。所以民间也有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与戏剧式的历史叙述方式,而且不同时代的艺人的叙述也在变化。民间戏剧舞台上的曹操形象与学者们写的史书上的曹操形象就完全不同。顾颉刚后来发现学者所构建的历史叙述也是在变化的,学者和民间艺人一样也总是以自己的想象来叙述历史。只是学者比民间艺人更复杂,他们还会造伪,会制造一个三皇五帝的具有严密传承体系的上古史。因此可以用研究民间戏剧故事演变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叙述的演变。于是精英的历史叙述与民间戏剧表演之间就有了一种同构性。在这一点上顾颉刚实际上将日常生活经验和普通民众的观念也融入了自己的学术和思考之中。顾颉刚后来运用这一认识来研究孟姜女故事时,也发现孟姜女故事情节随着时间与空间以及传承者的群体差异在发生变化。于是追寻其故事的演变成了最主要的研究目的。董永故事和孟姜女故事一样,也是一个流传了两千余年的民间故事,郎净在董永故事研究中也强调了民众的感情与想象。这一方面是继承顾颉刚的学术思路,同时也与她的戏曲演唱时的情感体验有关。

郎净的论著注重从历史与地域的时空纵横两个系统来分析这个民间故事,而且特别重视民众与官方以及文人创作的差异以及民众的感情与想象。在历史层面上,结合董永故事本身的形态,划分为董永故事的雏形期、渐变期、转型期、重铸期四个时期。在地域层面,从最初的山东博兴到后来的江苏丹阳、湖北孝感,乃至在清代以后又传到了广西、云南等地。因此董永民间故事的系统经过此番梳理已经大致呈现出来,在这里主要就是董永故事的雏形期谈自己的一点阅读感受。

故事雏形期在本书中作者界定为从汉代到魏晋时期,作者推定故事文本原产生在汉代下层社会,后来这个民间孝子故事被官方有意识地采纳进行孝道宣传,后来又反哺于社会。作者强调指出,父慈子孝这种发自天性的情感是先于文本而存在的,民间故事首先是民众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这一民间孝子故事后来作为汉代孝观念宣传的一个典型,这种传播途径在汉代的画像石中也可以看出来。由于我的博士论文《两汉孝社会伦

理及其传播》考察的就是汉代孝观念的传播情况,对这一历史时期,我个人相对熟悉一些,因此和郎净的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是重合的,因而我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郎净的博士论文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郎净的论文在论述汉代画像石时,注意到了其民间文化的特征,汉代画像石上的图案往往是社会上共同认可的人物形象。从而在这个层面上郎净论证了汉代的董永故事的民间性,董永在汉代的实际情形不像有些学者考证是一个上层官员形象。汉代画像石作为了解汉代民间社会的资料,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即地上的祠堂和地下的墓室的图案的功用是不一样的。我发现汉代画像石中的孝子图像主要集中在地上祠堂的画像石上,而不是在地下的墓室中。地上祠堂是展览给公众看的,因而代表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伦理规范,如汉代董永图像就是出现在武梁祠堂上的。而地下墓室中的画像石图案则更多具有个人的隐私性,一些有违当时时代伦理的图案如性生活图案就只能在地下墓室中存在。在这一历史时期,郎净主要论述了董永故事的务农与孝亲两个特征,抓住了这个民间故事存在发展的两个基本母题,即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以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规范的农耕社会的特征,而董永这个人物正是庶民之孝的最佳形象代言人。在汉代画像石董永孝子图中,董永父亲的形象占据整个图案很大的比例,而董永的人物在图案中相对较小,这说明当时的孝道是以子事父母为中心的。在故事雏形时期,郎净通过她的研究,揭示了董永从佣作养父到卖身葬父,从以父为重心到以织女为重心的故事自身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就是在这—时期孝子型的伦理故事也在渐渐向情感型的爱情故事演变。在这里,我也提出一点与郎净不同的看法。郎净认为汉代的神仙世界距离凡人相当遥远,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能与天神交游,所以董永画像石上的右上空飞舞的图案,不可能是织女,而曹植笔下的神女,也不可能是织女。而汤池先生在《文物》1979年第2期的《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一文中说汉代是有织女像的,西汉班固的《西都赋》中也有提到。因此汉代可能是有织女形象的,当然这一点在郎净的整本著作中并不是个关键环节,而细节上的争论在学术研究中也是难免的。汉代董永画像石上是否已出现织女图案?或者说即使考定了确实是织女图案,那么是否意味着在汉代董永孝子故事就已转变成一个爱情故事?或者已经有了爱情发展的可

能性？这些问题由于材料不足，还不能马上下结论。郎净对汉代的董永故事的分析是严谨的，在没有足够的材料的支持下，还是将这一时期视为以孝为中心的孝亲故事，只是到了魏晋时才向感情型的爱情故事发展。

在从唐代到清代的故事渐变期的论述中，郎净注意到了不同的民间故事载体与群体中其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如在孝子类的宣传与地方志中，故事主要人物以董永出现；而在各类民间故事、传说、戏曲中，织女或七仙女才是真正的主角，壁画与民间工艺中董永与织女是并列的；而在宋代文人的话本创作中，董永的身份也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农民变成了书生，这很明显是文人的自我意识的反映。这三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即官方、民众与文人。

在郎净的博士论文中十分突出的一点就是在董永故事的叙述与展开过程中，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进行，即官方伦理层面与民众情感层面。官方伦理层面总是把董永故事框定在孝道宣传的范围内，而民众却在不断地参与这个民间叙事，不断突破其伦理教化意义，其故事的受众十分广泛，民众以讲和唱的形式展开他们对董永故事的想象与再创作，并在故事中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与群体心愿，充满着时代色彩与生活细节。正如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中说要以“故事的眼光来看故事，不能用实事的眼光来看故事”，这是说表面上是故事在变化，实际上是叙述故事的民众的感情认同发生了变化。在民间社会层面，人们更看重的是内在的感情，于是董永故事演变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爱情故事。这也是民间故事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伦理与情感的一个内在冲突。当然，在董永故事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一些禁忌则一直存留在民间叙事中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天人相分的民间禁忌，如织女最后必须回到天上去，天上的仙女与地上的凡人不能永远在一起生活，这实际上已触及了中国古代的民众的强烈的宗教心理了。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实际上不是没有宗教信仰，它是被官方与文人士大夫压制了，从而存在于文化的底层。在董永故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天人两分的宗教禁忌。在郎净的关于故事渐变期（下）的论述中，对这一点也有一定的篇幅进行讨论。对天人两分的宗教禁忌及其民众长期以来的宗教基础，我们以往是不够重视的，我们以往总是讲天人合一，其实天人合一只是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境界，与民众的天人

两分的宗教禁忌有很大不同。在这一点上相关的探讨还可以更为深入。

关于董永故事与牛郎织女故事的融合,也是本书讨论的内容,郎净认为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女子明言自己为“织女”,为“天帝”所派遣,敦煌残本《孝子传》与之一致,这是董永故事与牛郎织女故事的融合,对于这一点,论述上还可以更充分一些。由于董永故事的其他时期如渐变期从唐代到清末这一时间段,戏曲的内容很多。在这一阶段,郎净搜集了大量的地方戏曲资料并作了整理,这与她对戏曲的熟悉是分不开的,我个人对于戏曲并不熟悉,也就不能就此发表太多的评论。

郎净对于诗歌、戏曲、体育均有一定的造诣,所以在这篇博士论文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行文中潜在的艺术气质。正是这一点可以说她很好地继承了顾颉刚先生民俗学研究中民间感情与想象尊重的学术传统。在民俗学研究中,研究者如果能充分尊重民众情感与想象,并为之付诸实践,那么我们就说这是民俗学研究的民主意义的体现。民众也有权利表达他们对历史与文化的理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以往不被重视的感情和想象发掘出来,并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反思我们自己。郎净是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文艺民俗学的第一个博士生,当初郎净主攻的是中国戏曲方向,对于黄梅戏有相当的研究,并选取了董永民间故事,是一个将民俗学与戏曲学结合的很好的学术个案。就目前的材料来说,这篇博士论文所达到的学术研究深度在国内是无可置疑的。本来按照中国人的学术习惯,我是没有资格给这本专著写序的,因为我和郎净都刚博士毕业,我们都刚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她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的出版本来应由她的老师来写序,但郎净坚持要我写,而我也对于其所取得的学术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也很乐意为此写序,并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这样的做法在学术界中也许有些骇人听闻了,不过,我们注重的是学术本身,其他也就不在意了。也许年轻一代人的学术成长,就是这样让前辈人目瞪口呆的。

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的纪永贵先生也开始撰写董永的博士论文,在他开始董永博士论文的写作时,郎净已在这一年的5月通过了董永博士论文的答辩。后来纪永贵先生联系到了上海的郎净,他的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郎净的帮助。郎净把她的博士论文送了一部给他作为写

作的参考。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关于董永故事的研究,已有更多的学者在关注。我们也期待关于董永民间故事的研究,不同的学者能够有更多的学术交流。郎净的博士论文作为国内第一部的董永研究专著,其出版自然有其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当然从最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我们仍然期待郎净女士在本书出版以后能采纳国内外学者的批评与建议,进一步搜集资料,在将来对这篇论文进行再次修订。

2004年5月于金华市浙江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

导 言

董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最早出现在东汉桓、灵时期的武氏祠画像之中,被作为“孝子”的典型加以宣传,到后来成为“二十四孝”人物之一,担负起中国“孝子”的形象代言;而对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传唱是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喜悦、淳朴,易于把握的爱情旋律,很自然地就传遍了全国各地——个案的发展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理”与“情”之对立范畴,这使笔者对个案产生了初步的兴趣。

通过对个案表象特征的分析,笔者进一步发现,这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个案:

该故事流传的时间跨度极大,至少是从东汉至今——这是一个较为完整、具有延续性的时间段。

该故事渗透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故事在东汉时期就已广为流传,以后的历朝历代,承载这个故事的受众层面,均为全体中国民众,不论贫富贵贱。

该故事流传地域极为广泛。从对东汉墓葬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当时董永的故事就已从山东博兴延伸至整个中原地区。经过各个阶层的加工、历经漫长的岁月,该故事现已流传至全国各个地区,地方戏是最好的例证,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已经有一百零一个剧种拥有或者曾经拥有该内容剧目;除了国内,该故事还流播日本、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及地区。

该故事的载体丰富多彩,具有出土文物、传世文献与民俗传承等多种传播途径。考古方面,历代壁画墓葬与唐代敦煌宝藏是两个最为重要的例证;传世文献方面,涉及纯文学、俗文学的大部分领域如诗歌、小说、戏剧等等;民俗传承方面,山东是董永民俗活动的中心之一,在今山东博兴县陈户镇董家庄,存有董永之墓,墓前有“汉孝子董永之墓”石碑一道。在董家庄曾有“董公庙”,并塑有大型董永像。民国之前,董家庄一带逢年过节,都要在董公庙和董永墓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并家家户户悬挂董永像。除了山东,湖北与江苏亦以认董永作桑梓为荣;湖北孝感还传承了元宵乞巧的风俗。另外,董永的故事还是瓷器、漆器、年画、剪纸等手工艺品的的重要内容。

该故事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旁收博蓄。随着时间与地域的变化,它又不断地被赋予新的传播方式或内容。

不管时光与地域如何变迁,该故事始终不懈地阐释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的范畴:“理”与“情”。

上述六个层次,是该个案最为基础与表层的特征,它们几乎涉及了传统文化中的人、物、习俗、制度、时间、空间等方方面面,可见该个案在传统文化中具有相当的地位。确实,这些表层特征,正是我选择董永个案进行研究的初衷。但是在与该个案一起穿梭千年风尘,感受悲欢离合之后,我发现故事讲述、历经的每一点一滴的细节与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它们远远胜过一个个漂亮的结论。

二

让我们首先作一个学术回顾,看一下该个案的研究现状。

个案首先是作为敦煌变文的重要文本,被许多学者加以重视的。最早的关注者是王国维先生,他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中,提及了“孝子董永传”,认为是“当时所作劝善诗之一种”^①。其后较为重要的论文有王重民的《敦煌本〈董永变文〉跋》^②、赵景深的《董永故事的

① 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第97页,《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八号。

② 周绍良、白化文主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演变》^①、邢庆兰的《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彝所传》^②、张乘健的《敦煌发见的董永变文浅探》^③等，高国藩所著《敦煌俗文化学》^④中《敦煌董永故事与俗文化》一文中也有详尽论述。

其次，不少学者从民间故事的角度研究个案。国内的主要有如汪国璠的《董永故事的起源、演变及其影响》^⑤，国外的有日本的饭仓照平的《董永传说的传承和冲绳的民间传说》^⑥等。

再次，把它作为地方戏的重要剧目之一加以研究。其中有王兆乾的《董永遇仙故事的演变》^⑦、《〈天仙配〉和〈女驸马〉的发掘和改编——答陈荣生同志》^⑧，何昌林的《两千年来的董永故事》^⑨，陆洪非的《物换星移几度秋——黄梅戏〈天仙配〉的演变》^⑩与《〈天仙配〉的来龙去脉剧坛话旧录》^⑪，班友书《黄梅戏古今纵横》一书中的《董永遇仙传说和〈天仙配〉演变史考》、《谈一谈董永戏文佚曲的真伪》^⑫二文，及其登载在《黄梅戏艺术》上的《也谈〈天仙配〉的来龙去脉——从青阳腔到黄梅戏，没有绝对的作者》^⑬等论文。

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大致介绍了董永故事的流传情况：论述的时间跨度自汉代到近现代。研究的主要脉络如下：

① 周绍良、白化文主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同上。

③ 《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

④ 高国藩：《敦煌俗文化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⑤ 《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1期。

⑥ 《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213号，1990年第3期。文中提及日本研究的成果，择其要有袴晴一郎：《冲绳的天体传说》，《冲绳民间故事协会会报》第8号，1981年5月；西野贞照：《董永传说》，《人文研究》6卷6号，1955年7月；金冈光照：《敦煌本〈董永传〉试探》，《东洋大学记要》文学篇第20集，1966年，东洋大学学术研究会；松村一弥：《董永故事的研究——中国民间艺能的生态》等等。

⑦ 《黄梅戏艺术》1981年第1期。

⑧ 《黄梅戏艺术》2000年第2期。

⑨ 《黄梅戏艺术》1984年第3期。

⑩ 《名家谈名剧》299—318页。

⑪ 《黄梅戏艺术》2000年第2期。

⑫ 班友书：《黄梅戏古今纵横》，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⑬ 《黄梅戏艺术》2000年第3期。

最初的体系:

西汉:刘向《孝子图》^①

东汉:武梁祠画像

三国:曹植《灵芝篇》^②

晋:干宝《搜神记》卷一^③

敦煌文本:

五代:句道兴本《搜神记》^④(S525、S6022、P2656)

董永变文^⑤(S2204)

《孝子传》^⑥(P2621)

二十四孝故事系统^⑦

民间故事系统^⑧

话本小说:《董永遇仙记》^⑨

戏曲系统:

北曲杂剧^⑩

南戏:《董秀才遇仙记》^⑪

① 关于《孝子图》的时代,意见不一。王重民、赵景深、狩野喜直等学者认为比干宝《搜神记》晚出,王重民先生考证:“刘向《孝子图》称:‘前汉董永’,其书未必向撰,(‘向焉知有后汉,又始见唐人称引。’)其说似近之;而一九八七年召开的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论证会认为,除《太平御览》外,《法苑珠林》亦曾引用此书,无‘前汉’字样。另外,《南史》中曾有《孝子图》记载,说明南北朝时尚有此书,认为《孝子图》出书仍旧是比较早的,有重要价值。

② 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第25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 选自《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二十四孝人物历代颇有变化,至元代郭居敬编纂《二十四孝》一书时定型,而董永则始终居其间。

⑧ 董永故事的主要流传地起初主要在山东、江苏、湖南等地,后来遍及全国,在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区域流布尤为广远:壮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京族等族都有流传。

⑨ 明洪楙:《清平山堂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⑩ 赵景深在《董永故事的演变》中提到:“不知是元朝还是明初,该有一本北曲杂剧是讲到这故事的。我已找到《雍熙乐府》卷十四收有《商调》一套。”

⑪ 钱南扬辑录:《宋元戏文辑佚》辑佚曲六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明代传奇:《织锦记》^①,顾觉宇作
《遇仙记》^②,心一子作
《孝顺歌》^③,无名氏作
清代杂剧《董孝》^④,四费轩主人作
地方戏^⑤

说唱文学系统:

弹词:《董永卖身张七姐下凡织锦槐荫记》^⑥

评讲:《大孝记》^⑦

挽歌:《张七姐下凡槐荫记》^⑧

宝卷:《小董永卖身宝卷》^⑨

民间歌谣^⑩等等。

以上初步介绍了董永故事的研究情况。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把它作为考古领域的一个课题加以研究。董永最早的“居身之处”为汉武氏石刻墓群,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早在北宋时期就引起了金石家的关注,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翁方纲得知发现武氏石室,叹为“古今著录家、鉴赏家所未有之大快也”。而在敦煌变文中他与孟姜女、武子胥、王昭君等历史人物一起,占据着重要

① 原有刊本,今未见。《八能奏锦》、《乐府菁华》、《尧天乐》、《万曲合选》、《万壑清音》均选《槐荫分别》,《群音类选》选《董永遇仙》、《槐荫分别》,《缠头百练》选《送子》,《大明春》选《仙姬天街重会》。

② 今无传本。

③ 今无传本。据钱南扬考证,此剧作于明末,见《南北谱及民众艺术中之孟姜女》。《曲海总目提要》亦云:此剧“一名《二十四孝》,明末所作,不知姓名。”见《中国曲学大辞典》,第44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④ 《董孝》:一名《董永葬父》。四费轩主人作。有《艺馀耳语》附录所收本。《中国曲学大辞典》,第483页。

⑤ 《中国曲学大辞典》记有十二种地方戏种有该剧目,日本学者饭仓照平的论文中记有二十二种,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约有一百零一种地方戏中有此剧目。

⑥ 谭正璧、谭寻编:《弹词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⑦ 杜颖陶编:《董永沉香合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⑩ 如《十二时·天下传孝》,任半塘编著《敦煌歌辞总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的位置^①，为敦煌研究者们带来了那一时代的讯息。(2)作为重要的民间故事加以研究，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在民间故事系统中占据着“第五把交椅”^②。(3)作为戏曲重要剧目加以研究，从脍炙人口的地方戏《天仙配》，我们可以一直上溯至元明戏曲。大多数研究，正是基于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出发点，展开考察的。

已有的研究基本勾勒了该故事从汉代到现在的流布情况。论题亦多数名为《董永故事的演变》。上文中我们已经基本综合与整理了诸文所述的董永故事的演变体系。

研究方法运用上：运用考证的方法，结合时代背景或者从文本自身出发对该故事的流传年代或内容进行考察^③；运用比较的方法，如把不同地域流传的故事进行对比^④；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如对情节进行解构^⑤。

研究所要达成的目的如下：

(1) 对董永故事作一个梳理。如赵景深先生在文中提到的“想对它的演变作一番探索”^⑥。

(2) 探讨董永故事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意义及影响。汪国璠先生认为：“董永卖身葬父是我国历史悠久、长期流传、脍炙人口的著名传统故事，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对历代作家文学和民间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⑦

(3) 把董永故事置身于某一重要系统，来看待它的地位，说明它的意义。如高国藩先生是把董永故事的演变作为俗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例证来展开论述的：“敦煌本《搜神记》与《孝子传》中的董永故事，把武梁祠、《灵芝篇》、干宝《搜神记》等几种不同的董永故事情节，融合在一起又创造出来了一个新的故事了。汉画像、《搜神记》至敦煌变文勾画出俗文

① 敦煌变文中有《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等。

② 前面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

③ 如注8所提及的关于《孝子图》年代的考证。

④ 如邢庆兰的《敦煌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彝所传》，见注3。

⑤ 如认为话本《董永遇仙传》情节最为丰富多彩，共有十九个基本情节，见注4。

⑥ 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敦煌变文论文集》，第705页。

⑦ 汪国璠：《董永故事的起源、演变及其影响》。